



杂忆杂议集

常崇宜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大西部文学丛书
成都市文联编

ISBN 7-5059-4013-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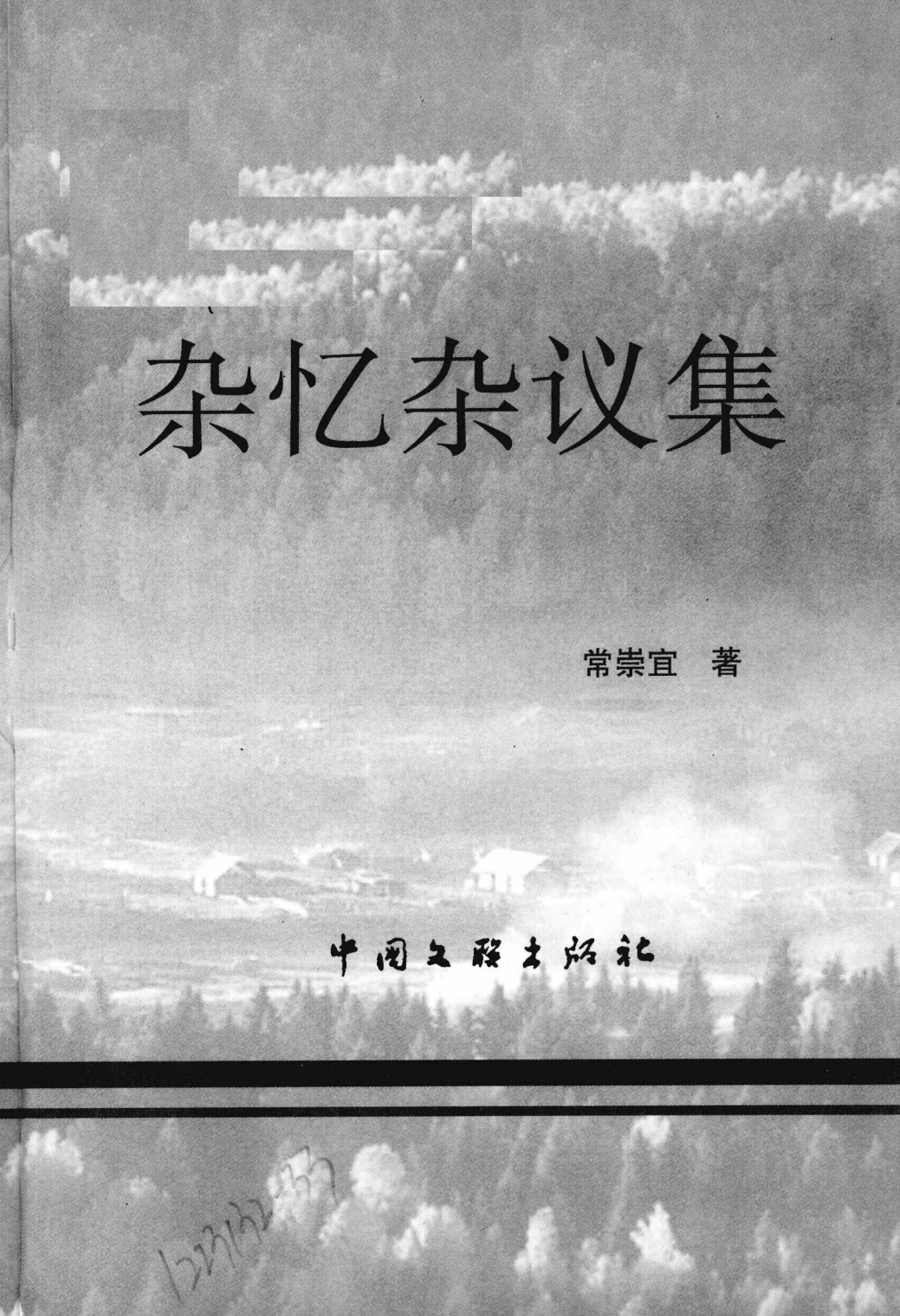
9 787505 940130 >

ISBN 7-5059-4013-9

总定价:120 元

12.00

四川省图书馆



杂忆杂议集

常崇宜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227132-3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杂忆杂议集 / 常崇宜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2. 2
(大西部文学丛书)
ISBN 7-5059-4013-9

I. 杂... II. 常...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7914 号

大西部文学丛书

书 名	杂忆杂议集
作 者	常崇宜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沙 雁
印 刷	成都市白马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540 千字
印 张	68
插 页	20 页
版 次	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013-9/I·3120
定 价	120.00 元 (全 10 册)

目 录

上 艺文杂忆篇

抗战初期的杂忆	(3)
我的小学和中学老师们	(16)
解放战争时期成都华西协中的学生运动	(27)
秘迹琐忆	
——兼悼念董继超和张先贵夫妇	(50)
海外散记	(63)
“三国”围棋佳话	(72)

中 秘书学杂议篇

面对 21 世纪的秘书职业	(83)
秘书的概念与定义的新高峰	(85)
辅助领导克服官僚主义	
——学习邓小平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	(89)
略谈秘书工作的基本规律	(94)
我国秘书职业的特点	(98)

秘书部门的运转机制·····	(104)
关于秘书工作性质的争论·····	(108)
我国当代秘书学建设的概况与成就·····	(112)
高级秘书为决策服务的特殊技能·····	(122)
秘书办事服务的三项特殊艺术·····	(129)
两类不同的秘书与秘书学·····	(133)

下 附录篇

风尘仆仆走南北 丹心一片献秘园

——记常崇宜教授的学术活动 ·····	黎培荣 (141)
评新编《秘书学概论》(摘要) ·····	王成昆 史玉霞 (150)
常崇宜著述目录(1996—2001) ·····	(152)
首页照片：作者和妻洪秀慧、孙儿常孝磊、孙女常乐	

艺文杂忆篇

(上)

[REDACTED]

[REDACTED]

抗战初期的杂忆

我的“第一次说谎”与“最后一课”

我的“最后一课”，没有法国文豪都德小说中的最后一课那样生动、凄婉。我的最后一课是在童年的无知与社会的乱轰轰中度过的，如今只在脑海中残留着淡淡的一点回忆了。而我的第一次说谎，却是记得很清楚的。

那一年，1937年大约是9月间，我满了六岁，刚刚在山西太原市国师附小读一年级。对这所山西最出名的小学，现时只存着一个校园很大、哥哥姐姐很多的印象。至于学校的老师的姓名、课堂教学的内容，是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。然而，却有两件事还记得。

第一件事，是我第一次说谎。有一天，天昏地暗，太原突然下起了少见的暴雨。老师在下课前对大家说：“今天雨太大了，你们最好坐一辆黄包车回去，你们的父母会给车钱的”。那个时候，在阎老西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很穷，山西人传统上更是特别节省。小学生都是背着书包自己上学堂，极少有要家长接送的。再说太原的自行车很少，汽车更是没有几辆，从来没有听说学生上学、回家发生车祸的，所以家

长们也很放心。我走出校门，只见黄包车夫争先恐后地叫喊着拉生意。我想起了老师的话，就坐了一辆黄包车，车夫说要两毛五，我是第一次自己坐车，自然不知道价钱，也不会讨价还价，稀里糊涂地坐回了家。一会儿突然听见家里的乳母和车夫吵了起来。乳母说：“这么几步路，平时只要五分钱，下雨给你一毛五，已经很够多的了。”车夫说：“是和你家的学生讲好了的，两毛五”。乳母进来怒气冲冲问我：“究竟讲的多少车钱，是不是讲的一毛五”？父母都不在家，我吓得哭了起来说了谎：“是一毛五”。在抗战初期的山西，交通不便，谷贱伤农，一元钱最多时可以买到两百个还多的鸡蛋，少说也值一百个蛋。车夫能拿到一毛五也就高兴地走了。我却内心为自己说了谎而惭愧起来。直到将近七十年以后的今天，尽管还几乎没有碰见一个不会说谎的人：商人们漫天喊价出售假货，教授们胡言乱语自我吹嘘，医药广告包治癌症，电视作者的特长就是乱造胡编，更不要说中外的许多官僚政客，离开了谎言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呢！但我总有着一种罪恶感：“我从小就是一个说谎者”！

第二件事，是有一天下午，父亲让我的绍温大姐带我去学堂，并交代说：“听听学校有些什么布置”。姐姐也对我说：“今下午不是上课，你不必背书包”。这可是稀奇事，去学校要大人带着，还不叫带书包。说起姐姐来，在我的眼中当然是大人，其实也不过是个初中生而已。那些天父亲好像忙忙乱乱的，住在我家的薄一波伯伯常和他商量什么事，一说就是半天。

到了国师附小，是分班开会。同学们吵吵嚷嚷的等了很久，班主任——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才来了。她哭丧着脸说着话，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。只在最后讲完了，我才发觉今天来了不少家长，有两个家长互相说话，一位说：“这一下不

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开学了？”另一位说：“娃娃不上学还是小事，全家人要逃到哪里去才平安啊”？我还看见老师用手帕一边揩着眼泪，一边向我们挥手告别。有的家长似乎也在哭。我问姐姐：“为什么不上课了”？姐姐说：“日本鬼子要打到太原了，学校停课了，好叫大家疏散”。我似懂非懂地想起：前几个月，太原城里还有些洋楼，插着日本的太阳旗，中国人见了都要远远地吐唾沫，骂几句。可见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。

从日寇侵略的那个悲惨的时候起，我的童年一直在流浪、逃亡和敌机轰炸与贫穷中度过，小学和初中都没有安定地上过几天学。以致后来在四川虽然混到高中和进了大学，也是严重的先天不足。我这一辈子，实际上是依靠自学读书求知的，始终是个“门门懂一点，样样都瘟”的“半罐水”。

车辋村与潞安府

父亲带着全家回榆次县车辋村老家，走的很急，在太原精营中街家里的图书、家具，统统没有携带。我还记得在生母逝世前，家中墙上挂着几幅唐诗书法，有一幅写着：“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，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”。长大后知道是唐代诗人王维的《少年行》。是唐代安史之乱，安禄山攻陷两都，诗人抒发杀敌报国心情的诗作。王维本来是著名的田园诗人，这首诗是“国难”深重的产物。后来还知道父亲在北平和太原，组织有一个转会，主要是商量如何抗日的问题。参加的人有张友渔、邢西萍、翦伯赞、高长虹、侯外卢等十几个人，其中许多是中共党员。薄一波于1936年9月从北平监狱出来，奉党之命回到太原。他曾写道：“在太原，我是阎锡山的‘上宾’，是‘高

级官员’”。(《若飞同志出狱前后》载《王若飞在狱中》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第7版)当时,为了工作的方便和避开阎锡山的监视,就不住官舍而住在精营中街我父亲的家中。王若飞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,也曾一度住在我家里。我父亲常乃德(字燕生),那时已经是大学教授、知名学者,回到山西屈任太原绥靖公署的秘书,目的是想推进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。父亲又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,青年党那时也是受国民党迫害,被国民党当做“异党”所禁止的。所以,薄一波和王若飞住在我们家,是十分安全的。父亲那时也就是三十八九岁,家中挂的那首唐诗,正好反映了山西一批中青年人抗日图存的凌云壮志。父亲在1933年完成了《山西少年歌》,内有:“泽潞论兵一代雄,飞狐上党掩天空。”“少年意气冲青天,少年少年毋自息;凭兹敢战英雄气,先救山西后全国。”很早就立下了抗日大志。

从太原到车辋村,路程并不远。我和三哥崇宾,望着窗外飞驶而过的田野、树林,数着零零星星看到的骡马和牛车,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,兴致很高。火车过了榆次车站,我们进厕所小便,把门锁住,后来却不知道怎样打开,急得在厕所里直是哭。眼看就要到东阳站了,还是打不开厕所的门。家人在外面也很着急,父亲请列车员冒险爬在厕所的车窗外,又说又比划,三哥才总算弄开了门。这时火车已经缓缓地开进了东阳,父亲后来说,要是到了东阳站还打不开厕所的门,就只好大家都不下车,到停车较久的太谷、甚至临汾再想办法了。

在车辋村我们住在南挑角,爷爷常运藻(字鉴堂)的院子里。这院子挺大,还有一座天桥通向街巷对面的另一座院子。爷爷住的院子比较简朴,都是平房,院子里有很宽的园子,种着蔬菜,还有几排高大的枣树、柳树一类的树枝。对

面一排房顶上放着一条大黑狗，终年很少下来，就在房顶上尽着它看家的职能。巷子对面的另一处房屋，是砖砌并且涂刷了灰的，看起来修建较晚，要洋气一点，庭院里种着几株桃、李、苹果树，因为兵慌马乱，树上还残挂着一些水果。我的乃恩六叔坐在果树下的石凳上，打一个懒腰，伸手就能摘下一个果子来塞进嘴里。我们到了车棚，才知道爷爷把所有能回来的子孙都叫回来了。爷爷说：“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到太原了，你们不能作亡国奴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家里我守着，你们赶快往后方跑，各自为国尽忠吧”。这次聚会原来是常氏家族车棚南支的告别会。“大难来时各自飞”。以后，这一家人在祖国的大地上，东南西北流散逃亡。爷爷守在越来越荒凉的老家，艰难地应付着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勒索，终于在1942年逝世，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和儿孙们。郭氏二祖母（蕙卿）留在身边照顾他，在抗战胜利后，又被阎锡山的士兵天天来催粮催款，无法应付，也终于对人生失去了一切希望，跳井自杀。我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曾写文章：“先父去世以后，庶母因为照管家务，直到胜利后还不能出来。”阎锡山“当局征派公粮过重，将家中几担麦子强索一空，并要征夫，家中既无壮丁可出，日出五千元雇人亦雇不到，村中将我庶母传去逼询，不堪其扰，于本年7月26日投井而死，享年52岁。”，他愤怒地表示：保留一切对阎锡山的凶徒追讨血债的权利。（见常乃德《无常与无我》一文）

这一大家人从此东奔西散。我的四伯乃恕按照地下党的决定，到南京从戎抗日，这是我大姐绍温（38年老党员）从山西老同志杜润生处听说的。结果被日寇南京大屠杀时杀害。南京灵谷寺的抗日阵亡战士纪念碑上，刻着他的名字。但是他的中共党员身份，因为时间隔得太远，已经没有活着

的人去证明，也没有人愿意去调查这些遥远的事了。他只不过是两三千万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中国人之一，没有结婚、没有后代，仅存于灵谷寺墙壁和几个常家的至亲的快要湮灭的记忆之中了。

我的七姑乃志，38年到了延安，参加革命，做过领导工作，今尚健在。其他亲戚长辈，跋山涉水辗转到了后方，二叔乃熹是工科学士，在灌县明明电厂和四川省水利处做工程师，三叔乃慰在疏散到江津的国立中学教书。五叔乃彝考进了黄埔军校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），当了低级军官，曾在湖北一带抗日。其他亲戚也多数在四川，有的在西安。他们都没有再见过车辋老家的父亲或爷爷。

在车辋村的日子很短，我还记得一些琐事。祖父曾叫全家去收割玉米，我虽然只有六岁，也扳了几包玉米，在烈日直晒下，口渴得厉害。这算是常家家族的劳动锻炼课程吧。还有一次，父亲带我们去拜望北支的子囊爷爷等老长辈，那是要行磕头礼的。我还去过南北两所祠堂，平时祠堂的大门尘封上锁，里面立着许多牌位，真有点吓人的。还有一次我突然被黄蜂蜇了一下，恰恰蜇在我的小雀雀上，顿时痛得大哭不止，还是郭氏二奶奶含着醋，用嘴在我的小雀雀上，把蜂刺吸了出来。那时的常家大院，经济衰落多年，实际上已经是一年不如一年。如今常氏庄园重新修建，那是政府行为，是搞旅游点。原来哪有那样富丽堂皇，更没有什么湖水啊。世上的名胜古迹，原本都是人造的。榆次政府培修名胜古迹，是为后世人们做了一件好事。

日寇逼进太原，父亲叫母亲带领全家往晋东南的长治——潞安府逃难。父亲仍然回到太原，是去和薄一波等朋友们商量武装抗日的。为什么要到长治去呢？一来是因为那时薄一波被阎锡山任命为晋东南沁县专区的专员，专员公署设

在长治。父亲的一个学生李荊生也被任命当了陵川县长，也在长治附近，属于太行山区，正是打游击战的好地方。父亲是想游击抗日，他的几首诗，“泽潞多奇人，狗屠或可致。”还有：“燕雀安知大厦倾，东来敌已入长城”并连呼。“呜呼晋人其速醒”“呜呼晋人其速起”，“左手机关枪，右手手榴弹，谁来侵我与谁战”。明确地表达了想到晋东南抗日救亡的决心。二来是母亲谯玉贞这时候已经怀了孕，不能崎岖远行，所以选择了晋东南的长治。当时人们虽然也知道这是一场大战，不过谁也不知道究竟要打多少年，打到哪里的。

从榆次到长治，沿途是出乎意料的荒凉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逃难的人们大都走的是风陵渡那条线，那里总算有阎锡山的窄轨小火车，而且过了黄河就到了陕西，离西安不远了，也是通向大后方四川的必经之道。我们走这条线到长治，是一个死角，连做生意的商人也很少。如果要从长治到后方，还得向东到河北绕道平汉线，而日本人是随时会沿着平汉铁路南犯的。记得沿途住的是鸡毛小店，吃的尽是硬面馍馍，没有蔬菜，七八个小时喝不上一口水。母亲和我们几个小的孩子，坐着人力车。大哥和二哥，常常是跟着跑。连走了三天，翻过无数的黄土坡，终于到达了长治。

不久，父亲也赶到了。母亲快要生产了，住进了一所荷兰天主教堂医院。父亲带着崇寅三哥去拜望了也已经来到长治的薄一波。薄伯伯也到荷兰天主教堂的医院来看望过我们。父亲本来是打算在长治乡间发动武装抗日的。七七事变以后，中共中央发表宣言，主张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，所以薄一波积极支持父亲的愿望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侵占太原的日军忙于向风陵渡进犯，而沿平汉线南下的敌之 104 旅团下元雄弥部队，在空军和优势炮火掩护下，侵占邯郸后突然转向西，经武安、涉县，往长治进犯。敌人来得太突

然，父亲只好带着大姐和二哥，转道新乡去武汉去了。薄一波则转向太行山区，组织共产党人继续武装战斗。后来，父亲到了武汉后，又去过大别山区，仍然不忘武装抗日，然而蒋介石和何应钦，要求凡要武装抗日的，一律要经过陈立夫的安排，不准自行组织游击队。加之日本军队又很快侵犯武汉，只好又向四川跑，他的武装抗日计划始终是一个梦想。

长治守军是武器靡劣，单衣草履的川军李家钰的47军的104和178两个师。那时的川军，都是不满员的，说是两个师，加起来也就三五千人。1938年2月的一天下午，我们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，隐约地听到了炮声。黄昏时分，炮声愈隆。母亲叫我们都不要睡，我们虽然是小孩子，却也知道灾难将要降临，也睡不着，都把铺盖顶在脑袋上，以防流弹。医院里的病人都紧张地等待着恶运降临。及至半夜，猛烈的炮声和哒哒哒的机关枪声震耳欲聋，敌人已经攻进了城，守军正在激烈的巷战。渐渐地，炮声、枪声小了下来，天亮时大地重归一片死一般的寂静。我们在黎明前入睡，一觉醒来，长治已经成了沦陷区。

日本鬼子侵占长治后，接连几天，都在抓人，大肆掠杀。我在天主堂的楼上，看见日军的军马放在田间吃老百姓的庄稼。城里只有一所英国人的基督教堂和我们住的这所荷兰人的天主教堂，成了人们的避难所。英国基督教堂是一所很小的福音堂，只有牧师夫妇两个英国人，容纳不了多少难民。天主教堂是晋东南教区主教所在，要大得多，有好几百亩地，周围县乡还管辖着十几座大大小小的教堂。荷兰人有两个主教，几十名神甫，还有几十名修女，已经在长治盘据了几十年，个个都会中国话。在沦陷前，差不多有上千的难民，携儿带女地挤进了教堂。荷兰人紧急地把男神甫们调到教堂里的各个区域，以便应付日本兵的骚扰。我们住的医院

里面的小教堂区域，是由一位年轻的高神甫负责的，他更说得一口熟练的中国话，晚上打开铺盖卷就在门诊室的长凳上睡觉。我的父亲那时已经是国民参政员，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抗日诗文。走时把四百块钱交给了教会，做为我们母子四人的生活费。荷兰人害怕有汉奸告密，为了保护我们，后来又把我们搬到修女住的屋子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去住，进出都要经过荷兰修女的寝室，以防止日本兵的侵犯。60多年后的今天，应当实事求是地说，荷兰教士与修女们，保护了许多中国人，是做了好事的。我还记得，有一位吕神甫，在他的寝室里，按着风琴，教我们几个小孩唱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华民族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……”伟大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也就是今天的国歌，竟是荷兰神甫教会的。还有一位叫芳济各的修女院长，向我们讲希特勒要侵犯比利时的事情，我们这些小孩子，那里知道什么是希特勒、比利时，还以为谁想吃白萝卜丝呢。修女严肃的神色，吓得我们没敢笑出来。后来懂得了希特勒是个大坏蛋，我问她，谁能打得过希特勒呢？修女摇了摇头：“没有人能打得过希特勒，只有天主会惩罚他。”

小孩子爱调皮。荷兰修女们很爱卫生，每天傍晚都要在寝室里打一桶水洗澡。那寝室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，我总不免要看看修女赤裸裸的白色皮肤，修女就会叫着说：“小孩子不准看”。修女看见我的指甲稍长，就要拿起剪刀剪，常剪得很痛。有一个专供荷兰人伙食的厨房，也是由荷兰修女做厨师的，有个厨师还记得叫尤利达丝。每天上午10点，叫我和三哥给相隔很远的男神甫和修女们送咖啡饼干，成为我们最高兴的时光。因为要从小教堂穿过许多建筑物走到大教堂区域，差不多要走20分钟，可以自由自在地观赏。有